

晋学初集

李元庆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晋

学

藏书章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集

李元庆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蒙莉莉

复 审:秦继华

终 审:刘秀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学初集/李元庆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 11

ISBN 7 - 203 - 04861 - 6

I. 晋… II. 李… III. 文化史 - 研究 - 山西省 -

文集 IV. K292. 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0524 号

晋 学 初 集

李元庆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 sxep. com. cn E-mail: sxep@sx. cei. gov. cn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煤田地质制印中心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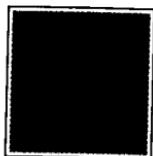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15.25 字数:400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

ISBN 7-203-04861-6
K · 327 定价:36.00 元



李元庆同志的新作即将出版了，我感到非常高兴。几年前，他的大作《三晋古文化源流》出版时，我和赵老（雨亭）联名写了序言。在那篇序言中，我们曾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近年以来，由于省内外学者的辛勤拓荒与不辍耕耘，有关山西古代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要成果。但与全国其他地域文化研究相比，其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宏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诸问题，迫切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归纳、概括、总结和升华，由此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如果说元庆同志的《三晋古文化源流》是适应这种需要而撰写并初步形成宏观理论框架的话，那么这本《晋学初集》则是其宏观理论的具体实践与升华。

山西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数千年来，文化积淀非常丰厚，历代先贤和有识之士都重视整理和研究三晋传统文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真正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党和国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国泰民安，经济繁荣，党中央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加上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正是具备了这些重要条件，才开创了研究和弘扬历史文化的新局面。

三晋文化研究会是一个民间学术研究团体，自1988年成立以来，肩负起“研究三晋之文明，创立未来之新风”的重任。15

年来，它组织和团结了省内外一大批专家学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出版了6400多万字、8900多幅图片的“三晋文化研究丛书”、“山西历史文化丛书”共171种248本，印数达到53万册。在这些成果中，有许多是前所未有的，像《山西琉璃》、《山西寺观壁画》、《山西古塔文化》、《山西民间艺术》、《三晋大戏考》、《晋国史》、《云冈石窟文化》、《山西戏剧图史》、《山西文献总目提要》等，还有《傅山全书》550万字，比清代出版的30多万字的《霜红龛集》多几十倍，因此，这些图书一经出版，即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李元庆同志的《三晋古文化源流》也是前所未有的力作，引人瞩目。

从目前看来，我们的研究工作仍有许多空白，须加紧努力。如三晋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过程中的源头作用、创新精神、文化特色及其与全国其他地域文化的比较研究等，需进一步深入。

李元庆同志的这本《晋学初集》可以说是一个初步探索。书中既有晋学理论的宏观研究和理论框架，又有对河东文化、雁门文化、晋阳文化、马邑文化等区域文化的描述和研究，还有对齐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的横向比较研究以及关于薛瑄思想的具体的个案研究。

晋学是个博大精深的汪洋大海，若探求其真谛，把握不住它的渊源、主流、发展脉络及内涵外延，就抓不住根本。元庆同志力图为我们研究三晋文化建立一个理论框架，即他的宏观、中观和微观说或他称之为的“三大理论层次”。这是符合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一般规律的，我们只有在总的方向、大的方面对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有了初步把握，才能顺藤摸瓜，才能对具体的研究有指导意义。反之，我们只有对具体的个案进行详细的分析，才能对规律性的总的特点的最后形成有所裨益。山西历史文化绵延漫长，积淀深厚，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有其不同的特色，对中国历史进程和华夏文明发展有其特殊贡献和独特作用；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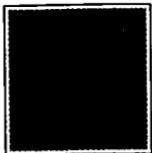
南、北自然条件迥异，风俗习惯不同，在历史上又经常分属不同政权、不同民族统治和占领，因而自有不同的文化发展轨迹和规律；山西历史繁复错综，人物风起云涌，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对山西历史文化的发展有个总体认识，又要对各个不同区域自身文化发展有所研究，还要顾及到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认识山西，了解山西，进而弘扬三晋文化，为我们加强对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培育民族精神做出贡献。

元庆同志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中科院哲学所研究生，长期从事文化理论研究。加盟三晋文化研究会以来，辛勤耕耘，著述颇丰，出版了《三晋古文化源流》、《中华地域文化集成·三晋文化》、《晋阳文化刍议》等专著，还发表了许多论文，他是“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的主编之一。2001年，我与元庆同志一起到台湾同当地学者交流三晋文化，感慨颇多。

志存高远，天道酬勤。2003年8月，李元庆同志以传承三晋文化的知名学者，在三晋文化研究会举行的成立15周年庆祝会暨第四届理事会上当选为副会长。我为有这样的同志感到自豪。在元庆同志新作面世之际，聊此感想，权以为序。

李玉明

2003年10月中国载人飞船腾空日
晋府梅山下双柏居



我和元庆先生相识是我到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以后，当时他退休已有五年了。从对科研人员的了解中，我知道元庆先生致力于三晋文化研究多年，是一位治学严谨、用功甚勤的学者。后来元庆先生将他的著作《三晋古文化源流》赠送给我，拜读之下，更觉元庆先生思维缜密，见解独到，对三晋文化或如本书所称的晋学确有自己的学术主张和理论框架。

和元庆先生逐渐熟稔起来是在 2001 年春天“华夏文明看山西”展览筹备工作中。“华夏文明看山西”是由省委宣传部、省文物局、省旅游局和我院共同举办的大型文化旅游展览，旨在用展览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反映山西的历史文化，反映山西在华夏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独特作用和特殊贡献，让更多的人了解山西，从而进一步树立山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形象；旨在通过对文化资源的整合、开发、利用，带动全省旅游经济、文化产业发展，推动文化强省建设。展览始终得到省委、省政府的关注和支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申维辰同志亲自担任展览领导组组长，而元庆先生因对三晋文化颇有研究被聘为展览顾问。对顾问一职，元庆先生真是做到家了。从展览最初文字稿的撰写到陈列方案的数易其稿和最终确定，从展览工作组的四处调研到展览的形式设计，元庆先生全程参与，不辞辛劳，对展览主题、历史定

6 序二

位、立论基础、史实考证等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甚至对陈列方案中的大小标题、遣词用语等都字斟句酌，思虑再三。展览从筹备到正式开展，用时一年多，元庆先生放下手中的研究，投入了全部身心。正是有元庆先生和展览工作组诸位同志科学准确的定位、认真求实的作风和踏实勤勉的工作，展览于2002年6月开展后，观者如云，好评如潮，达到了宣传山西、扩大影响、整合资源的目的，使“华夏文明看山西”成为山西文化产业建设的一个品牌。

10余年前，元庆先生就开始了对三晋文化的研究，1997年出版的《三晋古文化源流》是他那一段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他不仅自己学有成就，而且积极参加三晋文化研究会的组织工作，参与主编“山西历史文化丛书”，该丛书已出版百种，蔚为大观。2002年6月，由省委宣传部牵头、我院主办的“晋文化研讨会”召开。这次研讨会是近年来省内举办的同类活动中规格高、范围广、层次深的一次会议，与会代表中既有国内研究中国古代史、古代文明起源、晋文化和区域文化的著名专家，也有省内在古代史、晋文化研究中卓有成就的学者。元庆先生在研讨会上作的主题发言《关于晋文化的几个问题》既是对《三晋古文化源流》中观点的高度概括，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认识，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成为研讨会上讨论的热门话题。维辰部长自始至终地参加了研讨会，会后又撰写了《关于晋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对如何正确地认识、评价、开发和研究晋文化等作了深入的阐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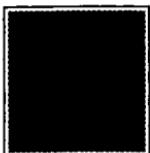
研究和总结晋文化，弄清晋文化发生、发展的原因，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晋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创新精神，为我们今天建设先进文化、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支持。2003年8月，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了《山西省建设文化强省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10年，基本建成拥有强势文

化人才、强势人文学科、强势文化活动、强势文化品牌、强势文化产业的文化强省的目标。晋文化或晋学的研究理应成为强势人文学科之一，而元庆先生的研究可谓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2003年是我院成立20周年。为集中展现20年内我院的优秀科研成果，院里组织10余位资深研究员和学术带头人编撰、出版他们的个人文集，元庆先生的这本《晋学初集》即是其中之一。这本集子是元庆先生10多年来潜心研究三晋文化的结晶，既有对三晋文化的全面审视，又有对各区域文化的具体分析，还有对齐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等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的横向比较研究，颇值一读。更令人感佩的是，他以古稀之年兀自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堪为后辈楷模。为弘扬山西丰厚的历史文化、繁荣山西的社会科学研究，进而推动山西文化强省计划，我们需要更多像元庆先生这样的学者。

张成德

2003年10月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我于 1978 年 10 月调入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1983 年建院至今。在这里度过了 25 个春秋，这是我一生中最充实的岁月。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毕业后考取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中国逻辑史专业研究生，当时就是想毕生做一名学者，然而直到进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梦寐以求的学术生涯才得以开始。此时的心情，始则兴奋，继之忧虑。兴奋者：终于可以去圆“做学者”之梦了；然而更多的是忧虑：青春已逝，年华不再，还能有所作为吗？

我所学专业为中国逻辑史，因而到社科院后，即与全国同行投身国家课题中国逻辑史研究。但是，身处省区，学术研究如何体现地方特色，为地方发展服务，又是必须直面的现实。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我国学术事业的劫后复兴和学界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中华地域文化研究逐步形成热点，三晋地域文化研究正期待学者们投入，于是当中国逻辑史课题初告段落，自己便转入对于梓同乡里的明代理学大师薛瑄思想研究。这是以历史人物为切入，全面投身三晋地域文化研究的起步。紧接着组织省内外数十位学者主持编撰了大型人物传论《三晋一百名人评传》，对于西周初年至清末 100 位山西历史文化名人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著述进行了系统述评，大体勾勒出了上下 3000 余年

来山西地区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也为自己的研究视野进一步朝向纵深和广阔的领域拓展开辟了道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起步较早、实力较强的地域文化研究已经取得相当的进展，达到相当的深度，其显著标志便是初步形成了宏观形态的地域文化学体系。诸如楚文化研究，“楚学”不仅“呼之欲出”，而且“毋宁说已经诞生了”；在此基础上，他们推出了涵盖18部论著的《楚学文库》，从多种不同学科领域展现了楚文化的全貌，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再如齐文化研究，首先推出宏观研究的《齐文化概论》，“建构起一套网络式的齐文化架构和完整的理论体系”，“齐学”也已初步确立了；与此同时，囊括45种著作、字数达1000万的“齐文化丛书”正在编纂，它分文献集成、资料汇编、研究专辑、人物评传四大系列，将为进一步拓展齐文化研究提供完整的史料依据和系统的理论素材。

地域文化学体系的确立是质的飞跃，是地域文化研究跃入全新境界的实质性标志。

在三晋文化研究领域，由于省内外学者的辛勤拓荒与不断耕耘，已经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重大成果，但和楚文化、齐文化等地域文化研究相比，其反差还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有关的一系列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诸问题，首先是宏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诸问题，迫切需要做出进一步的归纳、概括、总结和升华，由此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也就是各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迫切需要进一步升华为宏观形态的“晋学”理论和方法体系。这是三晋地域文化研究面临的时代课题。

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自己的研究视野便集中投向有关晋学体系建构的思考和探索。

“晋学”，或称“晋文化学”、“三晋文化学”，如同“楚学”、“齐学”等等，属于中华地域文化学之一。

晋学是以山西历史文化为研究客体的地域文化学科，属于文化哲学范畴的历史性学科。晋学体系的建构是一项基础理论研究课题，也是比较大和比较难的研究课题。

说比较大：从纵向看，跨越年代幅度大。山西历史文化经历了180余万年的漫漫延续，因而需从文化哲学视野和高度全面考察它的发展演进，深入揭示它的历史轨迹。从横向看，涉及学科领域多。就是需从文化哲学视野和高度，把众多相关学科的思想成果抽象升华为宏观形态的理论和方法体系。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说比较难：首先在于它比较大，所以比较难；而且还在于这是一项比较新的课题，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面临着一系列难点有待深入探索。

虽然，按自己的学术素养，从事这样一项比较大而又比较难的课题深感力不胜任，但是，这些年来，有关学者们的研究已经为晋学体系的建构创造了前提，又有诸如楚学、齐学研究的实践成就作借鉴，因此，晋学体系的建构已经有了相当的学术思想根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众多相关学科的文化研究已相继全面展开，研究成果日益突显。其中，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更具基础性、前导性意义。

在考古学领域，“晋文化考古”课题的确立和“晋文化考古”理论的形成，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晋学体系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考古学文化基础。20世纪70年代初，苏秉琦先生首次提出晋文化作为考古学文化研究，随之，王克林先生撰写了《晋文化研究》一文。接着，1985年的“晋文化研究座谈会”上，苏先生明确地“把‘晋文化’考古作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专门课题”提了出来，特别强调“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件新事”，是“大不寻常”的“新事物”，“是创举，是大事”，进而立

足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提出了“作为考古学命题”的“晋文化”的“界定范围”及其“三个组成部分”，由此确立了“晋文化考古”的时空框架，明确了它的内涵构成，形成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晋文化考古”理论。

“晋文化考古”理论是建构晋学体系的立足点，支撑点。

在历史学领域，对于晋国历史文化的研究是全面展开三晋文化研究的前导。20世纪80年代初，《晋阳学刊》由刊发张领先生《要重视对晋国历史和晋国文化的研究》为开篇，开辟“晋国史研究”专栏加以提倡，形成我国古代国别史、区域文化研究的可喜局面。与此同时，山西师大组建“晋国史研究室”把研究引向深入，进而推出了李孟存、常金仓的学术专著《晋国史纲要》。

伴随着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相关学科领域的文化研究也全方位地拓展开来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山西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了“七五”规划，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三晋古籍丛书”、“三晋古代名人评传丛书”等系列研究成果。在各学科成果的基础上，进而展开对于三晋文化的总体研究，便势在必行地提上了日程。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研究三晋之文明，创立未来之新风”为宗旨的学术社团“三晋文化研究会”宣告成立。它凝聚了省内外、海内外有志三晋文化研究的广大学人，对于山西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碑刻书法、寺观古建、雕塑壁画以及晋商文化、戏剧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等展开了全方位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

考古学、历史学以及众多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事实上已经创造了“晋学呼之即出”的客观前提，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自己的研究视野便势所必然地集中投向有关晋学体系建构的思考和探索。

晋学以山西历史文化为研究客体，属于文化哲学范畴的历史性学科，晋学体系涵盖了诸多方面的构成要素，我主要是从研究

理论和研究方法两个最具根本性的方面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初步形成了关于晋学体系的理论和方法架构。当时和以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文论，特别是《三晋古文化源流》和《中华地域文化集成·三晋文化》两部专著，便是力图阐释这个理论和方法架构的尝试。

关于研究理论。晋学是研究山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学科，属历史性学科，因此，确立研究客体的时空框架便是首先面临的基本理论问题。

时空框架即纵向时间区间（历史序列）与横向空间区间（地理界域）的有机整合体。确立时空框架，就是从纵向与横向二位一体的视角层面确立晋学研究的理论架构。这是展开晋学研究的理论前提，晋学研究工作便是从确立研究客体的时空框架起步的。

纵向研究的基本问题在于提出山西历史文化发展的断代或分期，横向研究则主要在于把握山西历史文化发展所呈现的不同地区差异特点。

以下即分别谈谈关于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初步思考。

其一，关于山西历史文化的断代分期。山西历史文化自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经历了 180 余万年的漫漫延续。西周初年至战国末年的晋国文化与魏、韩、赵三晋国家文化，可以统称“晋文化”或“三晋文化”，就以“晋文化”做统称吧！这是山西历史文化趋于成熟形态的发展高峰期，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轴心时期。据此，即可以这个时期为标界，溯源而探流，把山西历史文化的发展区分为“三个历史层面”，或者称做晋文化及其“源”、“流”这样三个历史层面。

第一个层面属于晋文化自身的历史发展。主要是在西周灭亡后，春秋战国空前激烈的社会大变革，有力地促进了中华地域文化走向繁荣，诸如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文

14 自序

化雨后春笋般地竞相崛起，晋文化便是当时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化形态。至战国末年，随着三晋国家相继灭亡，晋文化走完了自己的历史行程。

第二个层面属于晋文化的孕育期或史前期，亦即晋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就是说，晋文化于春秋战国时期勃然而兴，不仅有其广阔的现实背景，同时有着旷古悠长的历史渊源。这就是西周初年晋国立国前山西地区远古文化的漫长发展，为晋文化的崛起创造了历史前提，提供了历史根据，可谓孕育晋文化的母体。

第三个层面属于晋文化的历史延续和流变。秦汉以降，山西被纳入中华大帝国的统一疆域，不复存在诸侯割据的独立国家了，于是，山西大地孕育的晋文化传统犹如百川归海，融汇入中国封建文化的历史长河，连绵不绝地延续了下来，并随着时代的推移而进一步展现出生机勃发的文化风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封建文化宝库。

以上，晋文化及其“源”、“流”这样三个大的历史层面，正如同上、中、下三幅画面组合而成的历史长卷，向人们展示了山西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总体概貌。它内涵丰富，个性独特，渊源古老，遗风久远，在中华民族文化总体系中，在中华地域文化之林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

其二，关于山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地区差异特点。自远古以来，山西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人文传统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由此形成了山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南、北不同地区特点。

从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层面看：以临汾、运城、长治（上党）三大盆地为主体的山西南部属于中原古文化区系，自古是华夏（汉）民族农耕文化区；以太原（晋中）、忻定、大同三大盆地为主体的山西北部属于北方古文化区系，自古是戎狄（胡）民族游牧文化区。

基于此，也就提出了关于山西南、北两类“亚型”地域文化

的划分：南部以“河东文化”做称谓，北部以“雁门文化”做称谓。因此，南部地区中原华夏（汉）民族的农耕文化同北部地区北方戎狄（胡）民族的游牧文化交相辉映，二位一体，便构成山西地区历史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区历史文化的显著标志，亦由此成为中华地域文化之林中独一无二的文化形态。

在我看来，上述关于山西历史文化发展的三个大的历史层面和两类“亚型”地域文化的划分，应是确立晋学研究客体的时空框架，是全面展开晋学研究的基本的理论依据。

关于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源自研究客体，源自客体的内容，一定的研究客体产生一定的研究方法，拿黑格尔的话说，叫做“与内容一致的方法”。

我主要立足于山西历史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同时吸收和借鉴全国相关地域文化研究的实践成就，由此提出了关于全面展开晋学研究的“三大层次（板块）”的方法论构想。所谓研究方法的三大层次，是分别就宏观、中观和微观而言，其实这也是山西历史文化自身的三类客体形态或者说晋学研究客体的三类存在形式。这三大层次或三类客体形态的存在，应是晋学研究遵循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应是全面展开晋学研究的基本的方法论依据。

其一，所谓宏观研究，即是对于山西历史文化的总体研究。旨在从总体上揭示山西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把握山西历史文化的总体特征，展现山西历史文化的总体风貌，由此把对山西历史文化的研究升华为宏观理论形态。这是全面建构晋学体系的理论根基。

其二，中观研究，即是以宏观理论为导向，对山西南、北两类“亚型”地域文化分别展开研究。由此把对山西历史文化的总体研究推向新的纵深层次，同时也必将进一步深化对于中原古文化与北方古文化或者中原华夏（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与北方戎狄（胡）民族游牧文化的研究。中观研究可谓全面建构晋学体系的

两大理论支柱。

其三，微观研究，即是在宏观和中观理论导向下，再分别从纵向和横向多种不同的领域或侧面，对山西历史文化展开更深一层的专门性、专题性或个案性研究。诸如：以今山西省境为中心的晋与三晋区域的考古学文化、文化地理学、历史学以及民族文化史、民俗文化史、宗教文化史、思想文化史、艺术文化史、科技文化史、商业文化史，等等，等等，既可以是纵向贯通性研究，亦可以是横向断代性研究，还可以是人物、事件的个案性研究。

可以设想，一旦宏观、中观和微观研究呈现三位一体、协同共进的全方位拓展局面，那就是说，宏观和中观研究已经极大地深化了，微观研究也已经大幅度延伸了，“三大层次”的研究已经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全面展现出来了，标志着晋文化研究已经迈入全新境界。在这种局面下，极力呼唤的“晋学”可以说已经“呼之即出”，或者说已经诞生了，晋学体系的理论架构可以说已经粗具规模，或者说已经全面确立了。

总之，“三大层次（板块）”作为山西历史文化自身的三类客体形态或者说晋学研究客体的三类存在形式，亦如同宽幅不同的大、中、小三幅画面组合而成的历史画卷，从不同的层次上展示了山西历史文化丰满多姿的历史风貌。晋学体系便是这丰满多姿历史风貌的理论再现。

令人欣慰的是，时代跨入新世纪之初，晋学研究不仅已为我省和全国学界高度关注而形成热点，研究工作正朝向纵深拓展，它必将如同“楚学”、“齐学”、“鲁学”等等，在中华地域文化学领域雄踞“显学”地位，更重要的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决策，深入开展晋学研究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基础理论环节，进一步得到党和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有力支持，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和正在成为